

學術對談

## 數碼傳播與傳播研究的範式轉移及 全球化\*



香港浸會大學傳理學院於2006年12月中旬，以數碼傳播與社會變遷為題舉辦了一場國際研討會。會議的一個亮點是李金銓教授主持的論壇，論及互聯網、數碼傳播與傳播研究全球化等問題，發言者是來自各地傳播學界的重要代表，包括英國的Nicholas Garnham和William Dutton、香港的祝建華、美國的John Pavlik、加拿大的Vincent Mosco和大陸的杜駿飛。本刊有感於當日發言氣氛熱烈，各位直抒己見，值得研究者借鑒，特擇其要者與各位分享。李金銓教授及各位發言者事後抽空修訂講稿，謹此致謝。

---

\* 數碼傳播與傳播研究對談小組：黃煜、陳韜文、蕭小穗  
翻譯整理：王悅、盧歡、劉玉、王寧、盧雋婷、李璐霞



李金銓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傳播學講座教授，美國明尼蘇達大學新聞與大眾傳播學院榮休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包括全球傳播、傳媒政治經濟學，以及社會理論與傳媒研究的互動。李金銓是國際中華傳播學會 (CCA) 創會會長，中英文研究成果甚豐，在國際學刊發表眾多論文，近作(含編著)包括 *Chinese Media, Global Contexts* (2003)、*Global Media Spectacle: News War Over Hong Kong* (2002)、*Power, Money and Media* (2000)、《超越西方霸權：傳媒與「文化中國」的現代性》(2004) 等。



Prof. Nicholas Garnham：英國西敏寺大學 (University of Westminster) 傳播學院教授，為學刊 *Media, Culture & Society* 的創刊編輯並任該刊高級編輯至今。主要研究興趣是傳播政治經濟、信息社會理論研究及媒介政策等。Prof. Garnham 代表專著作包括 *Emancipation, the Media, and Modernity: Arguments about the Media and Social Theory* (2000) 和 *Capitalism and Communication: Global Culture and the Economics of Information* (1990)。



Prof. William H. Dutton：英國牛津大學 (The University of Oxford) 教授、牛津網絡研究院院長。曾任教於美國南加州大學。任多本國際學術期刊的編輯，其中包括 *Information, Communication and Society* 和 *Journal of Communication* 等，亦發表大量學術論文和著述。他最近出版的著述包括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 Information Society* (Co-author, 2004) 及 *Digital Academe: New Media and Institutions in Higher Education and Learning* (Editor, 2002) 等。



祝建華教授：香港城市大學傳播與新媒體教授，兼任 *Human Communication Research*、*Communication Research*、*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等學術期刊編委、*Journal of Computed-mediated Communication* 2002年亞太專輯主編之一、美國國家科

學基金會審稿人等職。目前研究興趣為互聯網和其它新媒體的結構、使用與影響，其成果發表在多種SCI和SSCI期刊。



Prof. Vincent Mosco：加拿大昆斯大學 (Queens University) 任教，為加拿大傳播及社會學研究教授。主要研究領域是傳播政治經濟學、新技術的社會影響及全球化。近年主要研究成果集中於傳媒、數碼傳播及電腦信息技術等方面。近作 *The Digital Sublime: Myth, Power, and Cyberspace* (Author, 2004)，獲得了2005年奧爾松修辭及文化研究傑出書籍獎。其1996年出版的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Communication* 已被翻譯成中文繁體版和中文簡體版。



Prof. John V. Pavlik：美國新澤西州立大學 (Rutgers University) 新聞與媒體系主任兼新聞資源研究所所長。發表了大量有關新科技對新聞、媒體和社會之影響的研究論文及書籍。其近作為 *Converging Media* (Co-author, 2003)。Prof. Pavlik也是多本學術期刊的編輯，其中包括 *Television Quarterly* 和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Television Arts and Sciences*。



杜駿飛教授：現任南京大學新聞傳播學院教授、傳播學系主任、南京大學網絡傳播研究中心主任。主要學術著作：《網絡新聞學》、《深度報道原理》(合著)、《彌漫的傳播》、《網絡傳播概論》(主編)、《中國網絡新聞事業管理》(主編)。當前承擔學術課題：《中國網絡廣告業現狀與發展趨向研究》，《中國網絡新聞宣傳管理研究》。主編及執行編輯叢書：「思想的境界」學術文庫(主編)、「新聞傳播學前沿」叢書(副主編)。

**李金銓：**我奉命主持這場別開生面的討論會，深感榮幸。為了同會議的主題銜接，這場討論會定題為「科技與全球化時代的傳播研究」。身為主持人兼「交通警察」，我且破個題拋磚引玉。

說到「數碼化科技」，電腦網絡的發展不過十來年，但是時至今日，在座各位在工作上和生活上恐怕不能「一日無此君」了。我們簡直很難想象網絡崩潰，從個人到國際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活動跟著癱瘓那種光景。數碼科技的確給我們帶來許多意想不到的機會和危險，合稱「危機」：科技是否導致人際溝通更淡薄？新科技是否取代舊科技？新科技提供解放的潛能，還是加深強勢政經文化的霸權？對於這些不確定的東西，人們總是充滿了神經過敏的焦灼感。我們只能以「已知」來推論「未知」，只能憑藉對於「過去」和「現在」的片面了解來預測「未來」。學術界「預知」的能力並不見得比一般人強，有時候還受到「知識障」的蒙蔽。如果仔細考察過去的歷史，我們發現每當一個新科技面世，不論是電報還是電視還是衛星，傳播研究者所提出來的問題脈絡何其驚人地相似。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反反覆復也許就是那些。

我想請教這幾位傳播研究的意見領袖：應該如何比較準確地理解「數碼化科技」對傳播研究的意義？這次數碼化科技「革命」是否如同廣告宣言，果真「劃時代」了，和以前的科技截然不同了，以至於會引發傳播研究的「範式轉移」？如其不然，我們豈非舊瓶裝新酒，以原有的模式來理解新科技？更如實說，數碼化科技全速發展，究竟改變了哪些傳統的傳播理論，有哪些問題特別值得傳播研究關注？

數碼化科技據說是「全球化」發展的組成部分。學界對於「全球化」的理解莫衷一是。有的追溯到羅馬帝國把基督教傳遍西歐世界，接著奧圖曼帝國持劍建立可蘭經的世界，這樣一路推下來，就是近代的大英「日不落」帝國，以至於當前聲稱要「把民主帶給全世界」的唯我獨尊的美國霸權。沃勒斯坦認為全球化的分水嶺是六百年來世界資本主義秩序的形成。今且從俗，把「全球

化」定義為1990年左右柏林圍牆倒塌、蘇聯解體、冷戰結束所進入的所謂「國際新秩序」。其間的進程據說受到了數碼化科技推波助瀾。請問「全球化」加「數碼化科技」改變了甚麼？對於傳播研究有甚麼啟示？

以我之見，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那就是傳播研究必須全球化。傳播研究一直唯美國和英國馬首是瞻，以它們的視野為視野，是一個徹底以美英為中心的價值體系。在這裏我們無法追究其歷史和現代的種種複雜因素，但能不能展開討論，探索有甚麼辦法或方向可以脫離過度依賴的學術困境？這個會在香港開。香港承殖民地(全球化?)的餘緒，自稱是「亞洲的世界都市」，卻是名副其實徹頭徹尾的學術邊緣地帶。請問如何建立亞洲或華人學術的文化自主性，使得學術發展得以和西方互相滲透，平等對話？這個遙遠的目標是否因為數碼化和全球化而提早端上學術議程？

**Nicholas Garnham**：第一個問題是數碼化是否意味着認識論的改變。我的答案很肯定：不是。我看不出來一枚微芯片如何會從根本上改變我們了解世界的方式，這對於我來說是一個奇怪的念頭。

當然，隨著全球性交流日趨便利，置身於彼此迥異情境下的諸位學者會擁有更廣泛的意見和觀點交流。並且，在多元視點交錯的情形下會產生更為豐富和細膩的思想見解，以及用新的方式來定義由人類傳播所帶來的種種問題。即使不能達到這種程度，至少也能改變人們對這些問題的重視程度。事實上，我的感覺是數碼傳播帶來的主要影響是一種重溫舊夢式的訴求，即那種無中介的傳播，直接的民主以及用全面啟蒙來解決社會衝突的夢想。當然，它是通過讓人忘懷舊的問題而使這些夢想遙不可及。不過這並不是說數碼化沒有帶來任何變化，只是這些變化顯得十分表面，我認為人們會日益認識到那些基本的社會問題依然如舊。除此之外，互聯網的使用對傳播模式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數據，這些數據如果使用得當，將在世界範圍內豐富傳播學研究的實證基礎，尤其是跨文化，跨地域的比較研究

將變得更為可行。這不僅因為大量的相關數據變得唾手可得，更因為全球的學者都可以按照他們自己的方法視點來分析這些數據。

**William Dutton**：讓我這樣來說明我的觀點：我認為互聯網在以下兩個方面對全球性研究和對傳播理論有正面的影響。首先，我同意 **Garnham** 教授的觀點，理論上說，新媒體並不新。如果我們發展出一個僅僅適用於數碼傳播和互聯網的理論框架，並沒有多大價值。但當我們著手探索互聯網，便會發現某些舊有理論或理論框架不再適用。互聯網研究使我們在眾多方面質疑舊理論應用於研究媒體和社會的價值。例如，許多有關傳媒效果的研究假設媒體能夠有效接觸大眾，所以這方面的研究多側重於闡釋媒體的內容如何影響人們的觀點和態度，比如議程設置理論 (Agenda Setting)。但由於新技術的出現，我們開始關注如何可以通往大眾，我們如何可以讓人們去接收媒體，人們如何和為甚麼會選擇某些內容而忽略其他內容，由此可見，互聯網對傳播和媒體的研究具有拓展性的正面影響。

我還認為，由於互聯網是全球性的，所以我們的研究和理論還需要進一步全球化。這是互聯網的另一個正面影響。過去，傳媒體系和活動是區域性的，傳媒研究還可以劃地為牢。但現在，要有所作為的話，我們的理論，研究和政策性建議就必須走出本土。例如我們在牛津的互聯網研究所做的研究就相當有效。我們的策略是認真做好英國本土的實證工作，同時以廣泛合作的方式將研究擴展到國外。我們不想太偏狹，圍守英國本土的經驗。舉一個具體的例子，就是我們開展的牛津互聯網問卷調查項目 (OXIS)。我們有高度可信的資料和分析結果，所以能夠告知英國當局關於互聯網在英國的使用狀況及其影響。與此同時，我們還參與了世界互聯網研究項目 (World Internet Project)，考察我們在英國的發現在多大程度上適用於英國以外的國家和地區。這讓我們可以在更大的國際講台上發表意見，我認為這很有意義。

我們還可以這樣來理解互聯網對全球性研究的價值：互聯網本身就是有用的跨界拓展工具。它成為了來自不同領域，不同國家和不同文化傳統的人們共同討論的焦點，它是我們的共同話題，因而有助於促進不同國家和文化的交流。

綜上所述，我認為數碼傳播研究注入了新的元素和新的研究考量。我們今日所見的有關互聯網的國際合作研究規模超越了我以往所見過的所有傳媒研究的合作，甚至超越了有關廣播的國際比較研究在頂峰時期所進行的合作。

**祝建華：**也許我可以在此分享一下我的經驗，我想從我為甚麼在七八年前開始從事互聯網研究說起。在這之前我一直認為，人類在處理信息方面的能力是有限的。二十年前，當我尚在做議程設置研究時，提出了一個新概念，叫做「議程設置的零和過程」(zero-sum process)。最初的研究是以美國與伊拉克的第一次戰爭為背景，分析其中媒體、受眾、政治家、利益團體以及社會其他部分之間的競爭關係。通過這一個案研究，我證明了零和過程在某些方面的效應。當我首次在美國新聞與大眾傳播學年會(AEJMC)上報告這一發現的時候，曾引起了一場關於媒體和受眾是否具有固定不變的信息處理能力的激烈爭論，一些從事議程設置研究的同行認為，媒體和受眾能力的限制來源於科技的約束。因為在那時，美國的有線電視上只有30至50個頻道。許多人相信，一旦當我們有了150個頻道，那些限制就可以被緩解了。我並不這樣認為，但是需要找到一個場合來測試多頻道條件下零和概念的有效性。不久之後，我們就見證了互聯網的興起。我意識到，互聯網或者可以成為測試這一概念的不錯的平台。因為在互聯網上，我們能看到的遠遠不止150個頻道，而有可能是150萬個頻道，這可以幫助我們去測試受眾是用盡了所有的頻道，還是仍然使用傳統媒體條件下同樣的認知模型去處理信息。而這正是促使我進入互聯網研究領域的最初動因。

在這以後的七八年的時間裏，我收集了大量的數據，都顯示零

和過程同樣也適用於網絡環境，說明人在處理信息方面的能力是有一定限度的。我們每天都上網，每人都有自成一套的頻道和網站組合進行瀏覽，一般說來，我們瀏覽的網站數目還是很有限的，而這也引發了一些相關的理論問題。比如說，一方面，我們都贊同公共議題的多樣性，受眾的多樣性，以及文化的多樣性等原則；但另一方面，這些多樣性會導致社會議程的分割和破碎。這些理論問題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決的。我和 McCombs 在 1995 年發表的一篇論文中，就詳細分析了在過去半世紀中，美國公共議程的多樣性如何導致了公眾注意力的迅速轉移和動蕩。隨著互聯網和其他新媒體科技的發展，可能會產生同樣的過程。

總之，我認為傳播學研究所關心的那些根本問題始終在那裏，但是互聯網和其他新科技的出現為我們提供了測試這些問題的新途徑。另舉一個例子，「互動性」是傳媒學者多年來一直喜歡使用的一個熱點話題，即使在有線電視和遙控器出現之前，學者們已經在探討受眾的互動性。但是，受眾會在多大的程度上利用互動式手段？互動方式又會在多大程度上對受眾的價值觀，信仰以及行為方式產生影響？這些在那時都很少為人所知。我們如今掌握了各種數據，記錄了人們與新媒體，尤其是互聯網、數碼電視和移動電話之間的互動關係。因此，新科技為我們提供了海量的機會以創建互動角色的理論。

基於我自己的經驗，我認為新媒體技術開拓了我們看待不同議題的視野，有些議題是向來已有的，有些是新產生的。Dutton 教授剛才提到互聯網上的人際互動關係，這很可能是互聯網研究中最亮的閃光點，尤其是對於那些從大眾傳媒研究背景進入這一領域的人來說。我們尚未為研究這一現象做好準備，但是它是如此的明顯，如此的重要，如此的意義深遠。至少對於傳媒研究者而言，它象徵著一些新現象的出現。我相信，在新的技術條件下，對一些舊問題的探討可以繼續，同時，新的技術條件也催生了一些新的問題。



John Pavlik：前幾位學者講到了重要的問題，我想再補充一下。說到研究議程，目前正在發展的一種研究是國際比較研究，我認為理解不同地區的異同是非常有意義的。技術的作用在於重塑媒介傳播和傳播環境的性質。我開始領會到一些很有趣的問題，當然仍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包括以前馬克思提出的有關社會生產工具和生產方式的觀點：掌握生產方式的人掌握巨大的權力，掌握生產和分配方式的人控制思想，進而控制社會。隨著互聯網和其他數碼媒體的興起，我們正在見證一個變革的開端，那就是生產方式和分配方式的變革。以往那些掌握生產和分配方式的人當然會固守原有的社會結構，所以一個重要問題是，在多大的程度上能夠改變這種控制？你可以看到媒體所面臨的障礙正隨著數碼科技的興起而日漸瓦解。現在每個人的手機上都有攝像鏡頭，大家都在拍照和朋友分享；成千上萬的人在寫博客，以此與不在身邊的人交流。如果你看到孟加拉經濟學家因其小額貸款的成就而剛剛獲得2006年的諾貝爾獎，你一定會看到小型媒體的相似發展。我覺得大眾媒體的概念正在發生戲劇性的轉變：變成較小型的媒體。

全球化背景下的數碼網絡有幾個重要的不同之處。一是傳播形式可以多對多，而不只是一對多，或中心對大眾。再就是媒介篩濾的作用大為削弱。傳統媒體有眾多把關人和編輯，但現在正在發生戲劇性的變化。這在國際環境下特別值得關注，看看各種力量是如何努力把持各道關口的。三是個人第一次擁有直通全球受眾的渠道。這個受眾群體不一定大，可能只是區區三個人，但他們可能遠在一萬英里之外，身處另一個國家。因此，跨越邊界的傳播能力是一個新發展，通過學術研究我們可以使新媒介的這種潛在特質顯露出來。所以我覺得有許多正在發生的變化，值得付出更多的媒介比較研究。有許多可以探究的問題，有些開發了新的討論空間，有的仍著眼於一些恆久的議題，但也有新的課題值得我們去關注。

Vincent Mosco：年齡漸長是件壞事，對於某些人來說，比如我，這意味

著頭髮日漸稀疏。但也有一些好處，比如說，有曾到此一遊的感受。我曾經參與許多類似的討論：究竟電視會不會改變世界，有線電視會不會改變世界，手提電話會不會改變世界，而今天的問題是互聯網會不會改變世界。

人總是在製造新科技的同時製造神話。電報被發明之時，人們舉杯歡慶和平將由此而生；之後我們聽到的是，電話將結束婦女被奴役的地位；廣播將把每一個房間變成卡內基音樂大堂等等。這些言論均摘自當時的流行文本。還有人斷言電視將帶來世界和平，如果美國人可以從電視中看到日本天皇的形象或者日本人可以從電視中看到美國總統羅斯福，他們就不會彼此開戰。同樣地，互聯網也被如此追捧過：歷史、地理和政治將因為互聯網而告一段落。新的神話總是伴隨著新的科技。

其實這也並無大錯，人們總要通過尋找一些故事來賦予我們所生存的時代以高貴的意義，對很多人來說，這樣做至關重要，但也帶來了一些問題。如果我們以一種癡迷的方式去關注科技，我們很可能把原本值得關注的社會關係忽略到最低限度。20世紀孕育了人類最重要的傳播科技，卻可視為人類歷史上最血腥的一段。即便是21世紀，發展前景未明，我們仍被蠱惑而將科技神化，並因而忽略了嚴肅的問題。的確，我們的研究正在改變，但是我不認為變化是互聯網所致，部分原因是研究者也正在經歷變化。這是甚麼意思？研究者是誰？作為研究者，你們可以是亞洲人、拉丁美洲人、非洲人，你們的數量也已遠遠超過三四十年前我開始傳播與科技這一領域的研究時的狀況。這就是變化的原因，你以自己的社會經歷——而不是對於西方某些研究片斷的模仿——來建構你的研究領域，這才是改變的動因。你是誰？這次會議的亞洲之行有一個現象給我很大震動，那就是女性正在從事研究。這些天來許多正在接受研究訓練或正在從事研究的女性學者來和我討論學術，她們的數量之多讓我感嘆。令人沮喪的是，她們的存在沒能在今天這個研

討會上得到反映(譯者注：發言者均為男性)。研討會應該反映她們的存在。

然而在我看來，互聯網不是改變傳播研究面貌的最重要的原因。互聯網確實重要，它是研究的工具；對於研究它的人來說，它也是研究的對象。從文化的角度看，我們看到神話被植入其中；從政治經濟學的角度看，我們看到權力的彰顯。但即使是看作研究工具或研究對象，我們也應該看到可能存在的陷阱。或者說，太多的學生用互聯網來取代實際的研究，取代面對面溝通，代替圖書館，代替書本，更不用說期刊文章了。互聯網當然是有用的，這一點毋庸置疑，但它不能代替傳統形式的嚴謹的學術研究。從事研究時，只是百分之八十的正確是不夠的，你需要接近百分之百的正確。令人沮喪的是，互聯網在百分之五十的情況下是錯的，事實上，你根本不知道哪個百分之五十是錯的。因此，作為研究工具，我們應該謹慎用之，不能用它來取代傳統的學術研究。作為工具和對象，互聯網提供了許多研究的空間，但是在使用的過程當中，我們應當慎之又慎。

**杜駿飛：**我恐怕不能完全同意有的同仁例如Garnham教授的看法。我以為，事實上，在這個數字媒體的時代，新媒體革命的的確確對認識論產生了深遠的影響。關於這一議題，我的某些觀點可以這樣表述：新媒介即人；虛擬即現實；結構即內容。

當我們見證到的「新的新媒介」嬗變為web2.0意義上的互聯網時，新媒介不再是自然、現實、或者虛擬的現實，而成為了人。介體隱匿了，而主體誕生。在人、媒介、世界的交流平衡中，「新媒介即人」的時代與麥克盧漢時代相似的是，它們都拋棄了介體。但是不同的是，它沒有再次走向客體，而是走向了主體：人本身。

「新媒介即人」意味著甚麼？意味著資訊與人的合而為一。這裏，新媒介與麥克盧漢時代的媒介差異在於，當人成為媒介的

核心，人類將從此不必屈服於資訊的異化；當人成為媒介的唯一時，人類終於可以在一個令批判哲學家不安的「媒介時代」，從對技術的懷疑走回到對人本身的思辨。這似乎是哲學的一個更為明智的選擇。

我還想表達這樣一個觀點——對新媒介來說，結構即內容。新媒介的內容不是依靠孤立的文本實現的，它是依靠一個強大的自組織的具有意義生成功能的結構來動態展現的。對於目前代表web2.0時代的網絡來說，如果能夠呈現出良好的結構，那麼它的系統內容就自動生長了；並且，它的意義會比文本本身更強大。這是每一個參與網絡溝通的線民都必須要考慮並且已經在面對的問題。因為，你並不僅僅是在參與溝通，而且在參與結構。你在加入一個宏觀的敘事，而它的內容比你所能想像的更強大。這種因為結構化而自動生長的內容，以及它所形成的社會溝通力、社會交往力，是以往我們所沒有見過的。網絡的進步本身並不重要，重要的是它進步的方向：尋找結構。

至於虛擬即現實的議題，恐怕我沒有更多的時間來具體闡述，我也不敢像Mosco教授那樣斷言虛擬有若干比例是現實。我只提及兩位學者的話：卡斯特在討論「真實虛擬的文化」時，曾經借助詞典來解釋virtual這個詞：「virtual：嚴格而論或就名義上而言雖然不是，但實際上是，「real：確實存在」。麥克盧漢則曾回憶說：phony在英語俚語裏的意思是「不真實」，它最初的意思是「像在電話上說話那樣不真實」。那麼，今天，有多少人還認為在電話上說話是如此的「不真實」呢？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們真的感到這個虛擬的時代不夠真實，那一定是因為我們還不夠虛擬。

**李金銓：**到目前，我們至少看到了數朵花在齊放，有的認為新科技並沒有改變人類社會的「根本」問題，有的認為新科技為傳播研究帶來了新的問題和新的機會。這兩種觀點似乎在不同的抽象層次發言，前者偏向於哲學沉思和社會理論，後者則是環繞以經驗歸納為基礎的理論，彼此既有點交集，也有點分叉。這兩種理

論必須理出有機辯證的關係，我不敢在這裏強作「主持人」，現在歡迎台上嘉賓針對彼此提出的問題進行交流，也歡迎台下嘉賓提出問題或發表意見。

**William Dutton**：Mosco教授觀察到每一次新技術的發展，都催生了大量預見新技術之影響的過度樂觀的言論。互聯網研究者在這方面是否有所貢獻呢？答案是肯定的。Mosco教授引述了一些這類天真預見，比如「廣播帶來世界和平」。報紙上充斥著各種烏托邦式或反烏托邦式的預言。然而，這些天真的預言通常出自於那些對新媒體的社會能動性惘然不知的人，我們就經常被一些才認識互聯網的人煩擾。他們可能是政治學家或者社會學家，在自己的領域有卓越的理論建樹，但發現了互聯網之後，便草率地作出諸如互聯網將如何影響政治權威或社會關係的荒謬預言。可以說，所有的社會學和政治學理論在面對新傳媒技術時都有偏失於過分天真和簡單化的可能性。因此，具有科技和傳播研究背景的學者便有可能參與討論互聯網的社會影響，並提出他們審慎的理據。他們檢驗過種種諸如此類的預測，他們的看法既有理論，又有實證的依據。我認為這些人知道互聯網是甚麼，瞭解使用或不使用互聯網所可能產生的社會影響，並且熟悉過去數年來互聯網研究的歷程，這些人將對互聯網研究作出有意義的貢獻。

**Vincent Mosco**：我同意這個觀點，我們確實應該著眼於社會關係，不能過分強調技術。的確，那些與新數碼科技關係最為密切的人製造了一些最為牽強、專斷和神奇的預言。事實上，他們當中許多人來自麻省理工學院 (MIT) 的研究中心——現代資訊科技的梵蒂岡。Nicholas Negroponte曾告誡我們，亞當的世界已經結束，我們都必須學會做一個數碼人。有人宣稱我們將要體驗死亡的終結，因為我們可以把思想、靈魂和意識上載到天上的巨大硬碟中去，他甚至在自己的暢銷書中為此定下了時間表。還有許多類似的言論，不勝枚舉，其中不少出自MIT的學者。但我不想特別針對MIT的學者，現實狀況是，那些最專斷

的神話和預言，往往出自學術界，出自那些與科技聯繫最緊密的群體。當然不是所有人都如此，例如William Dutton，他做過非常出色的研究，探討與科技相關的社會關係。我認為現在很重要的一點是，我們應該謹慎地使用像「互聯網研究」這樣的說法。難道我們要發展一個個領域並稱之為廣播研究、手機研究、電視研究？為甚麼要如此看重一個時代的某項看似主導的科技，並以此建立我們的學術領域？十年之後，我們仍會稱其為互聯網研究麼？我們真正要做的是立足於我們的社會經驗。我想提出這樣的問題：相互聯結、相互影響的狀況是否真如大家所言有加速和加強的趨勢？我們的語境或許更多樣化了，但未必更深刻。在五十年前一個大家庭中呈現出來的多樣性可謂豐富、深厚和錯綜複雜；比較起當今互聯網所帶給我們的體驗，其深刻程度已大不如前。這並不是說在新科技發展的當下我們不再有深刻的社會關係，但是在作出種種假定——例如一個加速發展的世界，一個平坦的地球，一種深化的親密關係——的時候，我們要非常謹慎，不要簡單地歸因於科技的發展。

**John Pavlik**：我想強調一點，不要誇大媒體數碼化的重要性和影響力。在這個世界上，影響社會關係的因素很多，媒介只是其中一個影響因素。但如前所述，我們需要在理論層面，更需要在具體的研究層面上來認真思考它所帶來的後果。如果你想知道有關問題，我會說，從孩子們使用數碼媒體和互動媒體的行為中去找答案，看看有甚麼不同。通過我對12至13歲兒童的親身觀察，我會說他們是伴隨著互聯網的普及而成長的，這在美國屬於第一代。我不知道如何去比較他們和其他國家的兒童，但在美國，他們是伴隨著互聯網長大，而不是伴隨電視長大的第一代孩子。當然手機也幾乎和他們同步成長，但是互聯網尤其能夠維繫他們與朋友的關係，特別是那些不在身邊的朋友。當然過去的人也可以使用電話，例如在晚上或其他時間打電話給朋友。但現在，他們只是想和朋友聯絡。社會關係成為他們行為

的動因，而他們也的確具有維護這些關係的能力。我不知道原因是甚麼。我不清楚關係如何發生變化，但技術的確在改變著社會關係的型態和強度，以及監控和通訊的方式。也許孩子們還會談論一些以前談論的東西，但現在有了即時通訊，如果你見過這種通訊，看過他們使用的語言，你會感到非常驚訝，特別是去到「我的空間」(www.myspace.com)，看到孩子們放上去的東西，以及他們表達自我的方式。他們這樣做，是因為他們覺得父母不會去看這種東西。

**李金銓：**在這個時候，我們怎麼為這場所謂的「科技革命」定位？它到底是不是一場劃時代的「革命」？科技本身決定社會關係的能力有多大？反過來說，如果放在歷史架構裏面看科技如何被吸納到既有的社會關係，移步換景，結論是否有所不同？

**郭振羽**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教授台下發言)：我們知道，許多年前麥克魯漢曾斷言：「媒介即訊息」。但是我們也許不知道的是，在他撰寫《古登堡星系》(Gutenberg Galaxy) 之前，我們都相信印刷術的發明是當時資訊科技的真正革命，它改變了整個世界。因此，當我們嘗試去回答「這是否一場真正的媒介革命」的時候，也許我們不應忽略我們正處身於變革當中。與變革距離太近，我們就可能難以在此時、對此變革作出有意義的表述。是否真的有一場變革正在發生？它又是否正在改變整個社會和整個世界？我們處身其中，所以我並不認為我們可以在此刻草下結論。也許下一代人回頭細看，就會如我所說，發現這場變革是真正的變革。

**Vincent Mosco：**你的說法確實明智，我很高興與你同屬一代人。你說我們未知「是否」，這對於學者來說是一個理智的說法，但是我們要做的，正是設法去解答這個問題。我們不能簡單地告訴人們：現在這場革命會是真的改變；或者等年輕一代來回答這一問題。回顧過去廣播的年代，雜誌連篇累牘地談論那些「廣播男孩」，他們都是廣播的狂熱愛好者：年輕，癡迷於流行文化，彷彿他們要通過廣播來領導西方社會的變革。畢竟，我們的溝

通方式與年輕人聽廣播的方式不一樣。電視也是如此。我們需要對歷史有更好的認識，不需要去強調我們所處的時代有別於其他。我們的時代當然不同，但怎樣不同？看到孩子們正在使用即時通訊軟體，這並不意味著這一時代有多麼不同。20世紀20年代孩子們在地下室自製無線電與周遭的人聯絡。我不知道各位的童年如何，我十歲出頭時做過很多類似的事情。雖然沒有即時通訊軟體，不能像如今數以百萬計的人們那樣受益於即時通訊科技，但是我們開發了許多方式來溝通、行動和反抗。

所以我認為，我們需要非常審慎，還需要真憑實據。如果說真有甚麼革命正在發生，我想那應該是氣氛的改變、社會關係的改變，因為證據就擺在我們眼前，日復一日地明朗。而對於科技，我們現在能拿出甚麼樣的證據呢？所以最後，我認為重要的是我們應當抵制盲目轉向社會和歷史健忘症的趨勢。我們彷彿已被它牢牢掌握，當新科技出現，我們就忘了以往對於科技的種種預言，並沉浸在自以為曠古爍今的想像之中。這可以理解，但也可能是誤解；甚至不只是誤解，還可能導致我們的生存方式出現災難性的錯誤。

**李金銓：**要換題目了。我同意Moscow教授方才說的，正因為有在座各位加入研究的陣營，我們這個傳播領域的景色當然不同了。這正是下個問題之所在：我們應該如何促進乃至達成傳播研究的「全球化」？我的朋友，倫敦大學的James Curran教授有一次問起我在美國中西部教書的經驗，我說最令人英雄氣短的莫過於美國學生不把美國看成國際制度的一部分，而是國際制度的反面；所以「外國」學生叫做「國際」學生。我們今天站在這裏討論科技和全球化帶來的變化，不管這是不是「神話」，我還是想問傳播研究如何「全球化」？我們在地球這一頭能起甚麼貢獻？當然，傳播研究一直是以美英馬首是瞻的，不但以它們的問題為問題，而且以它們的視野為視野。然而隨著我們的新一代學者崛起了，他們從西方學到了研究的語言和技巧，請問：他們究竟應該拴在實證主義的框架裏，一味證明哪個西方(擴展為「放



諸四海而皆準」的) 理論是對是錯的，以至於為「主流的」文獻寫幾個文化注腳呢？或者更應該著重對於文化意義的闡釋？更進一步說，我們如何處理理論普遍性和文化特殊性的辯證緊張關係？一方面，強調「普遍性」不能抹煞「特殊性」，另一方面，研究「特殊性」除了它本身有趣，也未嘗不是想瞭解「普遍性」。亞洲和華人學者能夠、應該扮演甚麼角色？

杜駿飛：就我而言，學術是解決問題、闡釋真知的路徑。傳播學的理论無外幾種：就普遍的傳播現象提出獨特的解釋；就不同的獨特的傳播現象提出獨特的解釋；就不同的獨特的傳播現象提出普遍的解釋。身處中國大陸，由於意識形態和時代進程的獨特性，我以為，我們這一代學者的主要使命，應該是力求誠樸地解決自己的獨特問題。

我們因何而獨特？這是一個需要冗長論述的話題；作為談話和回應，也許在這裏，我只需要提出一些雖非唯一性但富有個別性的例證：在中國，越境資料流程 (TDF —— Transborder Data Flow，點對點的跨越國家政治疆界的數位化電子資料傳遞) 可以成為對國家安全構成影響的最大因素，也可以成為對政治秩序構成威脅的最大因素 (原因是打破了原先的資訊封閉和非對稱平衡)；在中國，BBS的繁榮不是因為「討論」而是因為擁有「討論權」本身，同樣，blog的高速發展和社會學價值不是基於「個人」出版而是基於「自由」出版，不是基於「日誌」而是基於「言論」，不是基於「獨自」而是基於「圈子」。如是這般，林林總總的傳播景觀，並不是在「全球」尋常可見的。

在中國，從事新媒體研究的首要的學術壓力並不是甚麼全球化，也不是研究方法，更不是所謂的數位化技術新挑戰，而是學術良知的自我權衡。如前所述的網絡社會景觀，其中的核心就是權利和意志的角逐。Mark Slouka在其1995年的著作《大衝突：賽博空間和高科技對現實的威脅》中就曾經說過：「數字革命在它的深層核心，是與權力相關的。」尼葛洛龐帝也曾把權力的分散視為數位化生存四大特質之首，認為傳統的中央集權的

政治觀念將隨著網絡的發展成為明日黃花。只不過，他們當時未必能夠意識到，這種權利和意志的博弈在某些時候和某些地區會來得如此壯觀。事實上，如果他們說得正確的話，又有甚麼地區的數位革命的獨特、激烈、深刻性，比得上在當下的中國呢？

常識告訴我：我們這個時代的學術的緊張不安不是來自學術本身，而是我們自己。同樣，常識告訴我：無疑，來自西方的普遍的、經典的理論十分重要，但為它們提出注腳不是我們研究的歸宿。見月而忘指，得魚而忘筌，舍舟而登岸；那些「月、魚、岸」是我們所要的，而「指、筌、舟」是我們要經過並要捨棄和遺忘的。

**John Pavlik**：這個我不太清楚。就研究而言，能夠從亞洲和亞洲經驗當中學到甚麼，我也沒有專門的見解。不過我想強調，在媒介研究、傳播研究、技術研究和國際比較研究中，沒有甚麼能比觀察年輕人更重要的：看他們如何使用媒介，看媒介使用如何可以影響他們，而他們又是如何可以影響媒介的。研究不能不涉及年輕人，不管發生何種變化，他們都是最首要的行動者。我想我們已常常在亞洲的學生運動中看到了這一點，儘管他們不一定成功。技術的確在政治組織中和資訊獲取上扮演了一定的角色，否則獲取資訊的權利就會受到其他力量的壓制。所以我認為這是所有比較研究所應該探討的中心議題。

**祝建華**：對於傳播研究的全球化我們可以作出哪些貢獻呢？亞太地區的傳播事業和傳播研究曾經都是後來者。舉例來說，讓我們來看一下電視和廣播，尤其是電視。電視產生自40年代後期和50年代早期的美國和歐洲，70年代進入亞洲，直到80年代中期才被引進中國。當傳媒學者開始在亞太及大中華地區研究電視的使用以及電視對個人和社會產生的影響時，其社會結構和媒體技術已經同當年電視在美國等地最早興起之時大不一樣了。因此，當時亞太地區的傳媒研究學者在確認和測試許多起源於美國等地的理論概念方面遇到困難。現在的情形就很不同了。當

我們進行互聯網或者其他新媒體研究的時候，幾乎是與歐美站在同一出發點。相互的差距大大縮小了，我們不妨來看一下全球互聯網站的分佈，在互聯網時代甫始之時，大概百分之九十是英文網頁。如今卻形成了「三足鼎立」的態勢：三分之一的網頁使用英文，三分之一的網頁使用亞洲文字，另有三分之一使用歐洲其他語言。如果我們觀察一下互聯網用戶的構成，會發現同樣的現象：大概有三分之一的用戶來自北美，三分之一來自歐洲和其他地區，另有三分之一來自亞洲。同樣的，當我們將眼光投向互聯網的各種學術會議和研究，亞洲學者的表現也越來越引人注目。與傳統媒體研究相比，亞洲學者在互聯網研究方面能力更強，表現更加活躍和耀眼。當然，我們也要看到亞洲學者還應該努力使自己的研究更具有創意和原創性。據我所瞭解，我們這個地區的許多研究工作還是嘗試複製那些已經在美國或者歐洲取得的成果。我想，就數量而言，我們也許已經不輸給其他人，但是，如果以質量來衡量，我們還有很長的路要走。

**Vincent Mosco**：我也認為有太多同樣的研究被一遍一遍地重複。但是我要稍微地改變一下方向來討論學術研究的中心問題，從另一個角度來思考問題。在我們西方學者的研究和亞洲、拉美或者非洲學者的研究之間，並沒有甚麼鴻溝，我們一直在保持溝通。我們是傳播學學者，我們研究資訊，我們研究受眾，我們研究傳播的產製。傳播的工具有很多種，但是傳播的主體始終是人類。傳播如何進行，通常是由他們在歷史和社會當中的位置所決定的。他們的議程是甚麼？他們的階級背景是甚麼？他們與權力的關係如何？他們的種族歸屬如何？這些都是理解傳播的重要問題。對我來說，這更是研究的起點。在這一點上我們並沒有甚麼分歧，除非我們非要以「科技研究者」或者「互聯網研究者」自居來製造鴻溝，而不顧我們都是傳播學學者這一更為核心的定位。在此基礎上，我想談談一個我們重視不夠的研究問題。我們在傳播學的問題上大步邁進，同樣的，部分原因也是

在於我們正致力於此。傳播學的研究正變得更加國際化，在某種程度上也更具批判性，但是研究的焦點仍然在於傳播的內容和受眾。「受眾」這一概念也許應該從我們的論著中撇除，部分原因是，這一概念是市場催生出來的，本身不是一個學術概念。相比之下，我們倒是較少關注勞工，較少關注那些處於資訊傳播的生產和分銷鏈條當中的人們。在研究傳播和社會產製的過程中，我們應當更多地關注那個社群。

**William Dutton**：我想回到關於社會關係、全球化和學術研究的話題上來。我想，我們不必等到革命到來的時候才得出結論——那時候結論已經是人所共知的了。把革命放到一邊暫且不談，就讓我們先來看看有關社會關係的實證研究成果。

我不相信替代論 (譯者注：substitution paradigm，認為互聯網、手機等新的傳播技術能夠替代舊的傳播手段來維繫現有的社會關係。) 能夠解釋任何東西。簡單地認為手機或者互聯網有損社會關係的說法流於表面。舉個例子吧，有一天我女兒看著我的手機說：「爸爸，你的通訊錄裏只有三個號碼，你的社交生活實在太差了！」她當然是對的，她的通訊錄裏有很多朋友的號碼，她利用手機來加深和補充面對面的交流。大多數人，在大多數的時間，都是利用互聯網和手機以及其他的通訊手段來保持和加強他們已有的社會關係網絡。但與此同時，人們也利用互聯網大大地拓展他們的社會關係網絡。比如，在英國就有百分之二十的網民指出他們通過互聯網結交了新朋友。

這方面有一個很好的研究。在以色列，大約有一半的孩子能夠上網而另一半不能。Gustavo Mesch研究了這些孩子們所擁有的親密關係。他發現，相對於不使用互聯網的孩子來說，使用互聯網的孩子更有可能擁有家住外地且不來此地上學的好朋友。換句話說，他們更有可能建立起一個多元化的朋友關係網絡。互聯網使用和社會關係網絡的多元化之間，存在著統計上的顯著關係。

現在，每個社會關係網絡都是不同的，學術界內部的社會關係網絡也處在變化之中。我和祝建華教授是在網上相識的。和郭振羽教授相識於網下，但也是通過互聯網來保持聯繫的。由於使用互聯網，我能夠擁有一個更為全球化的社會關係網絡，而這一網絡又使我的研究能夠更為國際化。現在，我擁有來自世界各國的合作夥伴，從他們身上，我學到了怎樣可以在跨文化和跨國界的氛圍下工作。對我而言，互聯網的貢獻至少讓我能夠與世界各地的學者們以很低的成本進行交流。所以，我認為，互聯網將促進全球性研究，至少能讓它進行得較為順利。

**Nicholas Garnham**：對於全球化將對亞洲，尤其是中國的研究產生甚麼影響這個問題，我認為可從三個方面來解釋。

第一，日益增長的繁榮只會單純增加研究的數量，這點正在發生。研究歸根結底是關乎資源的，這類研究的論題同亞洲有關，並建基於本地區的實證數據。所以，它會擴展全球研究的數目。

但是這樣便出現了第二個問題：這種在亞洲地區出現的研究增長會帶來新的研究方法和問題嗎？我不知道。事實是，直到現今為止，仍存在著機械追隨和複製起源於歐美的方法和理論的趨勢。是否會發展出一種亞洲獨有的研究傳統還言之過早，雖然我對此存有疑問。當然亞洲國家所關注的問題次序肯定不同，至少一些基本的文化假設是不同的，因此會挑戰現存的「西方」看待事物的方式。不過對於它能否導致任何根本性的重新思考，我存有懷疑。

最後也是最重要的問題是，當今的研究範式和理論是否在某個深遠的意義上從屬於西方，而亞洲研究的增長則基於一種相當不同的哲學和文化觀？在此，我和Amartya Sen持有相同的觀點，他最近撰文駁斥理性科學分析世界的方法是西方獨有的觀點（他引用16世紀印度的開明時代和17、18世紀歐洲的開明時代在很多方面不相上下來證明）。我們不能忘記現今的數學起源

自印度和阿拉伯世界，我可能是錯的，但是，我並不認為所謂的亞洲人的世紀將為傳播研究領域注入根本不同的哲學文化思想。相反，我認為亞洲的研究人員和學者會加入日益增長的世界學者大軍，運用共有的知識工具來豐富這個面臨著相同的世界問題的全球學者社區。

**李金銓：**這場精彩的辯論可以無休止的繼續下去，但時間上卻必須收場了。記得當年Marshall McLuhan提出「科技決定論」，影響很大，後來文化研究的巨擘例如Raymond Williams力斥其非。回到傳播研究領域裏面，一邊有Ithiel de Sola Pool，自承是「柔型」的科技決定論者，聲稱科技發明促進資訊自由、多元與平等；另一邊則是Herbert Schiller，從左派政治經濟學的角度，說明新科技是霸權國家和霸權階級（對他來說是跨國公司）宰制的工具。今天的研討會是否有點複製這個辯論的味道？今天沒有人訴諸「全稱命題」，所以沒有陷入「全有」或「全無」的境地。大致說來，從社會理論強調科技「社會制度化」的學者，比較懷疑科技能為傳播研究帶來「範式轉移」；從經驗研究出發的學者一致覺得，新科技帶來種種好處，例如發掘新的變項、擴大參與跨文化研究的能力等等，但他們並未盲目樂觀，並未以為新範式即在眼前。這種問題會不斷辯論下去，但如果要有交集點，最好彼此在各個不同的抽象層次上交鋒，講清楚，說明白，免得你說你的，我說我的。當然，即使辯到最後，也許還是無解，那就求同存異了。末了，我想強調，科學沒有國界，但文化是有國界的。我始終相信，傳播研究必須一方面照顧文化的特殊性，一方面又具有理論的普遍性，這樣才能和「西方」（這個詞得仔細解構）學者平等對話，互相滲透，互相學習，互相瞭解。這算是我在總結這場討論會時所想表達的一點微意。